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化”问题

——以美国对中国防疫物资“安全化”为例

潘 玥 肖 琴

[内容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勇挑大国责任,紧急驰援世界各国。全球不少国家,尤其是美国,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的善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向美国捐赠或出售防疫物资的行为“安全化”,通过媒体和记者会等载体传播“安全化”动议,影响安全受众,并最终启动《国防生产法》。其原因在于,迫于大选压力,特朗普对内急需推卸延误疫情防控的责任,对华希望稳固中美贸易战的既得利益,最终达到稳固美国霸权的目的。对此,中国需要深入梳理并分析疫情的传播历史与路径,将其与中国责任“脱钩”,并且中国政府应从多途径严控出口防疫物资质量,同时以公共卫生外交的形式继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肺炎 公共卫生危机 安全化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潘玥,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肖琴,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新冠疫情暴发后,由于去全球化导致的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医疗卫生物资保障缺位引发的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失灵,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尚未完

善导致的政府失灵,^①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大国关系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体现出大国的担当与责任。中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向世界各国出售或捐赠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防疫物资,获得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赞扬。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多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希望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向世界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的行为在多个国家被“政治化”,在美国更是陷入了被“安全化”的困境。美国政府和社会出现了一种“依赖中国口罩,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②即使在病例激增而防疫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最初仍拒绝进口中国KN95口罩。^③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生动阐释,^④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精确扩展。美国将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援助和商业行为“安全化”,不利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美国将中国行为“安全化”的路径和动因,进而提出应对措施,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一、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既有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并与卫生外交、卫生治理、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等议题紧密相关。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逐渐呈现“安全化”趋势的背景下,国际关系与政治、公共事务与管理专业的学者开始从安全视角分析公

① 秦立建、王焯焯、陈波:《全球战疫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基于公共经济学视阈》,《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6~27页。

② 冯兆音:《肺炎疫情:口罩中间商、囤货者、生产商与政客的众生相》,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013453>。

③ Ken Bensinger, “Coronavirus Cases Have Surged, but the US Is Refusing to Take the World’s Most Available Mask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kenbensinger/coronavirus-ku95-masks-us-wont-import-china>。

④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凝聚全球合作共识 共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http://news.gmw.cn/2020-06/07/content_33891931.htm。

共卫生问题。晋继勇解释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路径,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已从传统的医学问题演变为威胁人民、国家、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问题,并将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变迁作为反映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表现。^①他还提出,美国逐渐从国家安全视角来审视和应对全球卫生问题,军事部门参与全球卫生问题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和霸权地位的重要途径。^②涂晓艳认为,传染病“安全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保障安全,防止传染病的流行。^③科林和西蒙承认艾滋病是全球悲剧,但否认这是安全问题,至少不是狭义上的国家或国际安全问题。他们认为将艾滋病“安全化”的过程远比文献中普遍认可的复杂。^④梅丽莎和乔纳森以越南和印尼对禽流感的“安全化”为例,分析了国内政治关系在疾病被视为安全威胁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了合法性、相互竞争的参考对象和受众对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对传染病作出反应的影响。^⑤克莱尔指出了全球卫生问题的“过度安全化问题”。^⑥克莱尔和黛博拉深究了巴西寨卡病毒“安全化”的原因,认为与以往案例不同,病毒本身及其受影响人数都不是造成安全威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巴西政府的政治目的、巴西国内政治发生动荡的时机及全球卫生安全。^⑦

这些研究表明,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确实与安全问题密不可分,但公共卫生是否应“安全化”还存在一定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领域相比,传染病的“安全化”过程更为复杂、变量更多且更需谨慎对待。另外,公共卫生议题“安全化”

① 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路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25~229页;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以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变迁为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20~24页。

② 晋继勇:《国家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外交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9~134页。

③ 涂晓艳:《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131~142页。

④ Colin Melnes and Simon Rushton, "HIV/AIDS and Securitization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Issue 1, 2013, pp. 115~138.

⑤ Melissa G. Curley and Jonathan Herington, "The Securitisation of Avian Influenza: International Discour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Issue 1, 2011, pp. 141~166.

⑥ Clare Wenham, "The Oversecuritization of Global Health: Changing the Terms of Deb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5, 2019, pp. 1093~1110.

⑦ Clare Wenham and Deborah BL Farias, "Securitizing Zika: The Case of Brazil," *Security Dialogue*, Vol. 50, Issue 5, 2019, pp. 398~415.

是呼吁全球重视该议题的方式之一,旨在解决威胁国家安全,乃至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疾病问题,但也被一些国家当做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的手段。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正常出售和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行为被一些国家“安全化”。

本文将借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与安全化理论,分析美国对中国在疫情期间的商业和援助行为进行过度政治化操弄甚至“安全化”的问题。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是“公共事件从非政治化——政治化——安全化的过程”。^① 安全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包括指涉对象、安全化主体、安全化载体和受众。完整的安全化路径应该包括:(1)安全化启动: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或社会资源的安全化主体通过“言语—行为”指涉某物为威胁;(2)安全化传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效应两大功能说服受众共享安全认知;(3)塑造安全受众,听众接受安全化动议。^② 安全化旨在理解和建构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识过程。^③ 成功的安全化有阶段之分或程度高低之分。安全化问题可分为一般性安全化问题和特殊性安全化问题。前者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受众接受了安全化动议,但政治权力部门没有迫于压力采取“非常规”措施。后者是指不仅受众接纳了安全动议,而且政治权力部门采纳此安全动议,也认定指涉对象受到威胁代理的威胁,并主动采取了“超常规”的举措。

将中国防疫物资进行政治化解读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安全化”的全过程,或不属于成功的“安全化”,因此不是特殊性“安全化”问题。但在中美防疫和医疗物资风波中,美国完成了特殊性“安全化”问题的全过程,即“安全化”主体指涉中国防疫物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民众接受这一说法,且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超出正常政治程序的紧急措施,启用《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要求多个企业参与防疫和医疗物资的生产。这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和代表性。

① 王凌:《美国对他者的安全化:路径与动因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②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74页。

③ [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二、中国向美国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行为被“安全化”路径

在新冠疫情遍及全球之际,中国遭遇疫情重创后仍选择帮助其他国家,向世界各国捐赠和出口口罩、防护服和试剂盒等防疫物资。这一饱含人文关怀的正常举措却在特殊时机和环境遭到美国政府指责。美国总统、国务卿和白宫贸易顾问等多个政府内阁成员用阴谋论解读中国的这一行为,并将其“安全化”,最终达到将其污名化的目的。美国政府进而启用《国防生产法》,要求美国医疗企业按政府需要优先生产紧缺物资,并要求非医疗生产企业生产防疫物资,以缓解因政府误失防疫良机导致的美国国内疫情大暴发的困境。

(一)启动“安全化”动议:“安全化”主体宣布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的危害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主体是一个集团,如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等。^①他们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并能通过他们的“言语—行为”构建威胁。指涉对象是指由安全化主体所识别的、其安全需要得到保护的行为体。存在性威胁或威胁代理是威胁的制造者或威胁的来源。^②而启动安全化动议指的是安全化主体宣布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的危害。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最初阶段,中国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2020年3月,当中国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时,全世界深陷疫情的泥沼之中。对此,中国在保障自身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以捐赠或出售形式,向世界各国提供防疫和医疗物资。然而,特朗普总统及其智囊团,如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等人却在新闻发布会及社交媒体等多种场合和载体上公开指责中国,为中国扣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关于3M公司口罩的各种言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彼得声称,“中国实际上已接管了为美国公司生产口罩的工厂,即美国3M公司,并

① [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②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80页。

将其国有化。”相关分析人士还说,“中国还希望通过让高级外交官宣布捐赠来寻求政治影响力”,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岱利索(Jacques deLisle)认为“这肯定会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工具”。^①之后,阿扎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控制与口罩有关的许多原料以及生产能力。”^②美国口罩生产商和政客中甚至出现“依赖中国口罩,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③事实上,3M公司早在多年前因中国有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及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将工厂迁到中国,其大多数产品也是供应中国市场。

在此过程中,试图将中国向美国出售或捐赠口罩的行为“安全化”的主体是美国总统和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其中还有些属于对华鹰派人物,如对华“鹰派中的鹰派”纳瓦罗。他们污蔑中国“控制”3M公司并将其“国有化”,认为中国的捐赠是“政治行为”与“外交政策”。这些人拥有政治地位与社会权威,因而更能煽动民众情绪,影响民众判断。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捐赠与出售医疗物资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为人类卫生健康作贡献,但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安全化”主体将其视为存在性威胁,认为中国的此类行为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些极端和激烈的言行试图将其衍生成为政治化事件,并以美国国家安全为指涉对象,将这一政治化事件进一步上升为“安全化”事件。作为“安全化”主体,美国政府的部分官员通过不符合事实的言语一行为误导公众,宣称美国国家安全受到中国捐赠或出口行为的威胁,启动“安全化”动议,即依赖中国口罩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二) 传播“安全化”动议:“安全化”载体制造现实和认同

安全化传播的过程是安全化载体进行社会动员,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效应说服听众共享安全认知。^④安全化载体是媒体,他们通过议程设置与框架构建向

① Keith Bradsher and Liz Alderman, “The World Needs Masks. China Makes Them, but Has Been Hoarding The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3/business/masks-china-coronavirus.html>.

② 王山:《美国政府将启用〈国防生产法〉增产口罩防护服应对新冠病毒蔓延》, <http://www.rfi.fr/tw/%E4%B8%AD%>。

③ 冯兆音:《肺炎疫情:口罩中间商、囤货者、生产商与政客的众生相》,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013453>。

④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82页。

公众传递信息,即通过报道的数量和强度来影响接触到信息的公众,并利用人们的已有认知来构建框架和确定主题,从而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思想或对事物的看法。^①在美国政府高官污名化中国口罩和中国行为时,美国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构建推动上述“安全化”动议的现实,并加深了公众对“安全化”动议的认同。较典型的案例有以下两个。

一是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将“新冠病毒”故意称为“中国病毒”。自2020年3月16日起,特朗普一直强调“中国病毒”,声称新冠病毒起源中国,中国应为之负责。3月19日,《华盛顿邮报》摄影记者波特斯福德(Jabin Botsford)在社交媒体透露,他拍到特朗普将白宫新闻发布会演讲稿上原有的“新冠病毒”划掉,手动改为“中国病毒”。^②白宫记者会的规格高与传播效应大,特朗普选择在如此重要的公开场合,多次将世界疫情归咎于中国,其心可表。他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不断在公开场合和社交媒体抛出主观意图明显的话语,由疫情话题吸引民众注意力,希望通过极富煽动性的不实言语和媒体的传播,在短期内影响公众的思考和讨论,引起美国民众对中国高度警惕,使中国成为大众舆论质疑的对象。

二是以《纽约时报》和《美国之音》为代表的主流新闻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多次以中国口罩和中国疫情为攻击对象,扭曲事实,编造信息。2020年3月16日,《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已将口罩工厂的产出全部据为己有,中国的采购和捐赠也将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大部分供应带到中国。”^③文章还引用了名人的观点,如纳瓦罗说“中国将美国3M公司国有化”,戴立安说“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捐赠行为会成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④试图利用名人效应和具有权威性的“安全化”主体,增加对民众的说服力。这些以看似客观态度报道的新闻在无形之中将“中国口罩”

① 王凌:《美国对他者的安全化:路径与动因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学位,第41页。

② Zachary Petrizzo, “Washington Post Photographer Caught Trump Crossing out ‘Coronavirus’ to Replace It with ‘Chinese Virus’,” <https://www.mediaite.com/news/washington-post-photographer-caught-trump-crossing-out-coronavirus-to-replace-it-with-chinese-virus/>.

③ Keith Bradsher and Liz Alderman, “The World Needs Masks. China Makes Them, but Has Been Hoarding The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3/business/masks-china-coronavirus.html>.

④ Keith Bradsher and Liz Alderman, “The World Needs Masks. China Makes Them, but Has Been Hoarding The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3/business/masks-china-coronavirus.html>.

推向负面舆论的风口浪尖。《纽约时报》4月3日题为《所有的口罩都在哪?》的文章指出,“中国长期的(疫情)暴发导致其减少了(对美国的口罩)供应。”^①针对封城一事,《纽约时报》于3月8日在推特发文称“中国封城是以牺牲人民自由为代价”,但20分钟后却称“意大利封城是冒着经济风险保欧洲”。同样是封城,只因执行主体不同,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意大利,《纽约时报》的态度迥然不同,其政治立场显而易见。《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也认为,新冠疫情让美国人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并列举了众多美国官员关于依靠中国口罩和医疗物资将会威胁美国经济和医疗安全的说法。这些官员包括纳瓦罗、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美国医药智库黑斯廷斯中心高级顾问罗斯玛丽·吉布森等。^②

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只是美国“安全化”主体传播其“安全化”动议的一部分。这些媒体罔顾事实,散发错误信息,误导美国民众,将美国物资匮乏的原因怪罪于中国,进而牵涉进美国医疗、经济和军事安全等更多问题。基于上述记者会或新闻报道的传播,美国“安全化”主体将他们构建的这一议题框定在“国家安全”内,即将中国向美国捐赠或出售口罩的行为与安全挂钩。“国有化”和“外交政策”等话语暗示并引导美国民众认可“依赖中国口罩,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一“安全化”动议,企图引导公众聚焦并支持这一动议。

(三)“安全化”结果:受众接受“安全化”动议,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安全化的目的是安全化主体利用安全化载体为遭受存在性威胁的指涉对象塑造受众,使其接受安全化主体建构的安全化动议,从而实现某一议题的安全化。而塑造受众的关键在于利用公众的可塑性和权威阶层的引导性,促使受众接受安全化动议。

公众具有可塑性,^③即公众的观点和倾向可能受媒体煽动和渲染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公众的是非观可能随着安全化主体的言语—行为和载体对安全化动议

① Amelia Nierenberg, “Where Are All the Masks?” <https://www.nytimes.com/article/face-masks-coronavirus.html>.

② 斯洋:《美企将建新口罩厂,医疗供应链有望回流美国?》,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mask-making-capacity-03-17-2020/5332885.html>。

③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86页。

的传播而改变。短时间内,由于新闻媒体充斥着大量过激、虚假且黑化中国口罩及中国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行为的报道,加之特朗普即时的“推特外交”,中国口罩和中国捐赠或出口防疫物资的行为成为热搜主题,而美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3月,美国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将美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归因为中国的责任。^①而4月8日,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Harris Poll)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90%的共和党受访者将冠状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而67%的民主党人持相同看法。^②显然,在“安全化”动议的传播影响下,美国民众和政府官员大都接受了“安全化”动议,不仅认为依赖中国口罩会威胁美国安全,而且将美国新冠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

由于公众更倾向于相信权威阶层,权威阶层的观点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与走向。权威阶层对公众观点具有引导性。^③权威阶层引导公众持有某种观点,但如果公众得知了所有信息并进行分析,并不会自发导出上述观点。^④一开始特朗普称新冠病毒为“外国病毒”,之后一个阶段他故意将其改称为“中国病毒”。纳瓦罗表示,“我们不需要的是危机期间的某种宣传活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已经让这场危机变得比本来会有的程度严重得多”,中国已开始搞“口罩外交”。^⑤作为美国总统和政府高官,他们的一言一行深刻影响着美国民众。特朗普和纳瓦罗所表达的是否属实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民众惯于去接受权威人士所抛出的观点,他们不会,也难以主动去了解事实真相。哈里斯民调总裁马克·佩恩(Mark Penn)曾说,共同应对中国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也是明智的政

① 《从疫情看中美政治文化差异》,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90B91B80514EVRQ.html>。

② Zachary Evans, “Poll: Americans Report Bipartisan Distrust of Chinese Gov’t, Support for Tariffs,”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poll-americans-report-bipartisan-distrust-of-chinese-govt-support-for-tariffs/>。

③ 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87页。

④ John R.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3.

⑤ Keith Bradsher and Ana Swanson, “The U. S. Needs China’s Masks, as Acrimony Grow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3/business/coronavirus-china-masks.html>。

治。^① 将与中国的对抗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办法在无形之中已将中国归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四) 美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启用《国防生产法》

随着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不断增加, 美国“安全化”主体为其“安全化”动议塑造了听众, 成功引导美国民众将中国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的行为视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美国一度禁止进口中国口罩并宣布要自己生产。2020年3月25日, 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启用《国防生产法》, 加快美国生产医用口罩以及防护衣的速度。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麦克金(John McGinn)指出, “这项法案可以帮助特朗普政府获得更大的权力, 确保私营企业加快紧急医疗用品和设备的生产和分配, 让政府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有广泛的权力, 要求生产商增加应对产品的生产规模。”他还认为, “《国防生产法》允许国防部将政府的订单‘优先化’, 私营企业生产时需要首先生产国防部规定的、对美国国家安全优先的产品。”^②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口罩生产商的生产规模与计划, 也影响了其它企业, 如美国政府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呼吸机。

综上所述, 通过四个步骤, 美国成功地将中国向其捐赠或出口防疫物资的行为“安全化”(见图1)。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安全化”主体指涉中国向美国捐赠或出口防疫物资的行为是存在性威胁,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并启动“安全化”动议。随后, “安全化”载体, 即记者会和新闻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效应制造现实和认同, 传播“安全化”动议, 并成功使目标受众接受其“安全化”动议, 形成了一个完整、成功的“安全化”路径。同时, 为回应存在性威胁和“安全化”动议, 美国政府还采取了“超常规”的紧急措施, 即启用《国防生产法》, 要求多个企业开始生产防疫物资, 使这一问题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安全化”问题。

^① Zachary Evans, “Poll: Americans Report Bipartisan Distrust of Chinese Gov’t, Support for Tariffs,”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poll-americans-report-bipartisan-distrust-of-chinese-govt-support-for-tariffs/>.

^② 孙卓:《特朗普启动国防生产法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防部前高官向一财这样解读》,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O1Zkpm5wJmraOqHowjh3K62PkLMTUmm4utfdRsfS7nza4to0wa_T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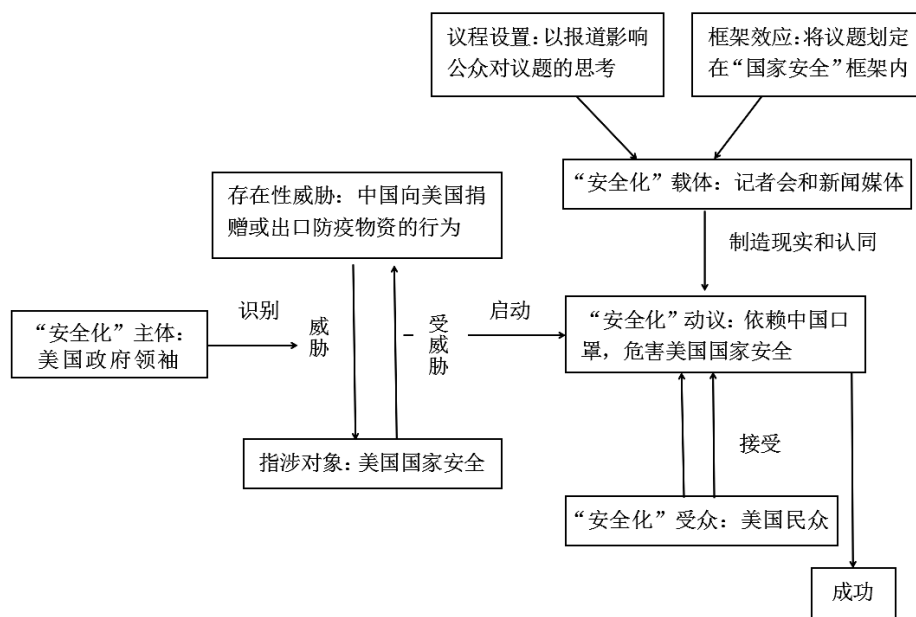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向美国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行为被“安全化”的路径示意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国向美国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行为被“安全化”的原因

美国将中国向其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的行为“安全化”是总统大选、中美贸易战和霸权维护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 大选压力下,特朗普政府急需推卸疫情责任

2020年11月3日,美国将迎来第59届总统选举。特朗普能否连任与其对疫情的处理密切相关。在疫情暴发初期,特朗普政府树立积极的、能够掌控疫情的形象。早在中国和世卫组织向世界发出疫情警告时,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声称美国不会受疫情影响。在美国出现病例时,特朗普也多次称美国疫情在可控范围之内,并将新冠肺炎比作流感,鼓励民众不戴口罩。特朗普面对疫情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坚定颇受美国民众认可。随后,美国逐渐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患者、现有患者、新增患者和累计死亡人数都高居全球疫情数据榜首。由此,特朗普政府开始改变策略,以各种方法推卸疫情责任。其实,

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对特朗普支持者态度的影响有限。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共和党人更重视就业、恐怖主义和军事等问题,民主党人则更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类传染病和气候变化问题。^①但是,疫情对中间选民的态度有明显影响,而这一群体是特朗普力图争取的对象。疫情在美国急剧恶化后,特朗普指责中国,其民意在短期内有所上升。随后,由于特朗普没能妥善地处理疫情并造成严重后果,以及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的不当表现引发族群冲突,其民意明显走低。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移民众注意力,进而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将美国疫情归罪于中国。他将新冠肺炎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指责中国口罩存在质量问题,中国提供的防疫物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启用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防生产法》,要求其他不相关企业参与口罩制造,强行要求美国3M公司停止出口口罩,引发多场口罩风波。

(二)中美贸易战的现实利益驱使

受疫情影响,中美贸易战似乎被暂时搁置。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捐赠和出售防疫物资行为“安全化”的举措也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打压中国医疗行业、污名化中国防疫与医疗物资质量,以及将中国的善意行为“安全化”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保护美国医疗行业的重要策略。

在疫情背景下,美股多次熔断,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深受影响,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从中国进口口罩和呼吸机等防护物资不仅会让中国生产商获得巨大收益,严重损害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现存利益,更会直接伤害到美国医疗及相关产业,引发本土企业的不满。为此,美国不仅质疑中国口罩质量,将中国捐赠或出售抗疫物资的行为“安全化”,还向中国索赔巨额疫情损失,引导国际舆论。这导致短时期内全球掀起了多场质疑中国口罩和呼吸机质量问题的闹剧,并诱导多国加入向中国索赔的阵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医疗产业必将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而中国捐赠或出售防疫物资的意图也将被世界各国猜疑。如此,特朗普政府即使难以保护其国内企业,但却也直接伤害了中国企业。实际上,中

^① “Majority of Americans Confident in Biden’s Handling of Foreign Policy as Term Begi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02/24/majority-of-americans-confident-in-bidens-handling-of-foreign-policy-as-term-begins/>.

国捐赠或出售物资的行为被“安全化”并非孤例。在全球新冠疫情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刻意指责中国的抖音和华为等企业,试图将这些企业的活动“安全化”。

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一步启用《国防生产法》,赋予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之名扩大关键材料及产品生产的权力。该措施是为了拒绝使用中国的口罩、呼吸机和检测盒等防疫物资,避免中国企业从美国疫情中获利。这不仅达到打压和污名化中国企业的目的,还带动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改善美国愈加严重的失业现状,在民众心中树立特朗普政府坚决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与企业利益的形象。

(三) 巩固美国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基本原则,以实际行动声援各国,获得多国首脑、媒体和人民的赞扬。与此相反,美国不仅禁止向国外出口紧缺防疫和医疗物资,还停止对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援助,使世界疫情雪上加霜。由此,从大众舆论到受惠国家,包括美国盟友和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度将提升。这将损害美国长期维护与巩固的大国威望与声望。为了阻止中国企业在疫情中得到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捐赠或出售防疫物资行为“安全化”,质疑中国口罩和呼吸机等抗疫物资的质量。

总之,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捐赠或出售防疫物资行为“安全化”源于大选、贸易战和国际政治权力竞争等多重考量。这不仅损害中国医疗行业的利益,还损害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

四、中国的应对措施

美国将中国出售或捐赠防疫物资行为“安全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恶化中美关系,甚至影响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应严肃并深入分析疫情由来,攻破“中国阴谋论”,将疫情与中国责任脱钩。在物资出口方面,中

国应严控出口防疫物资质量,加强政府监管,适当增加干预措施。此外,中国还应通过公共卫生外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一) 深入分析疫情,使疫情与中国责任脱钩

多国将中国捐赠或出售物资行为“政治化”和“安全化”后,向中国索赔和要求中国承担新冠肺炎的全球传播责任等言论此起彼伏,并在以美国为首的舆论推动下甚嚣尘上。究其原因,是因为各国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和传播渠道等不了解,盲目听从部分英文主流媒体的偏见报道,从而将疫情发生与传播的所有责任嫁祸给中国。深入分析疫情,并运用恰当的和合理的方式向全球公众展现实事真相,将疫情与中国责任脱钩。

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的真实来源尚无准确消息,但海外许多媒体认为该病毒来自武汉海鲜批发市场,甚至有媒体妄称来自“武汉实验室”。对此,中国科研团队应与全世界专家通力合作,尽快查明病毒来源、传播方式和变异情况等,抓紧研发新冠疫苗,以应对可能更严峻的危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尽可能深入探究新冠病毒的相关问题,帮助全人类更清晰地认识这一病毒。但是,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不能责怪任何一个国家,不能以来源地命名病毒,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的公共卫生危机,大家都是受害者。最近,中国团队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和疫苗的研发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今后中国团队的任务及与其他国家团队的合作还任重道远。

除深入分析疫情外,中国媒体还有责任将中国的成绩和对世界的贡献公之于众,将客观事实展现给世界人民,将疫情责任与中国脱钩。在当今的世界媒体格局中,英文主流媒体占据了主要地位并主导全球舆论方向。中国媒体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仍大有可为。针对国际社会污名化中国的谣言,中国主流媒体、自媒体公众号可以充分开发推特、脸书和优兔等新媒体资源。同时,中国媒体不应只停留于英文报道,而应进行面向全世界人民的多层次、全方位和多语种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多语种平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与人民网等多家媒体都在多国设立驻外机构,这些媒体可以成为中国驳斥西方“中国阴谋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工具,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全面、更客观和更公正的中国形象。

(二) 严控出口防疫物资质量, 监管与干预适当结合

疫情期间, 芬兰、西班牙和捷克等欧洲国家出现了质疑中国防疫物资质量, 尤其是口罩和检测试剂盒质量的多起事件。这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国家形象。对此, 中国政府应严控出口防疫物资质量, 加大质量监督力度, 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府干预措施, 在特殊时期对特殊物资采取特殊手段。

在中国出口的防疫物资出现质量问题并发酵后,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严查事实真相与原因。中国商务部经过调查后指出, 防疫物资质量问题的出现多是因为“中外质量标准不同, 使用习惯存在差异, 甚至是操作不当导致非医用口罩用于医用用途”。^① 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2020 年第 12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 要求加强非医用口罩出口质量监管, 进口方承诺所购非医用口罩不用于医用用途, 同时进一步规范医疗物资出口秩序, 要求出口方和进口方签署共同声明, 确认双方接受产品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② 这些举措有效地解决了中方出口的防疫物资中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

中国政府还应建立专门的监管和治理机构, 充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切实防控非法商家将不合格的防疫物资输送至国外, 严惩违反政策法规的商家或个人。在全球疫情大暴发的特殊时期, 政府有必要针对与特殊紧急防疫物资相关的事宜采取特殊手段, 如成立出口防疫物资检测部门, 监督检测出口防疫物资的质量与安全, 确保出口防疫物资满足出口国的所有要求; 加大政府干预力度, 专门划分出口防疫物资生产工厂, 专供国外有需要的政府、企业与个人, 或专售给国内代理商, 减少特殊时期“重大战略物资”的转手次数, 顺利、安全地将中国合格防疫物资送到国外。

此外, 现有政策大多针对的是大批次防疫物资的进出口问题, 政府还应该针对个人购买防疫物资并寄送到国外的问题制定政策。在保证个人寄到国外的防

① 《商务部: 防疫物资出口中出现质量问题, 很多是因为中外质量标准不同》, <https://finance.ifeng.com/c/7vzHCB6YgWj>。

②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4/20200402958970.shtml>。

疫物资质量的前提下,简化个人向海外华侨或外国友人寄送特定防疫物资的手续。

(三)以公共卫生外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疫情没有国别与种族之分,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倡议。公共卫生外交即是构建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公共卫生外交与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相辅相成和相互作用。在全球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向多个国家、世卫组织以及非盟等国际组织提供防疫物资和资金等,并派遣医疗专家队或线上传授经验。中国的多家大企业也纷纷向外国捐赠防疫物资。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这些行为可以被视作公共卫生外交的一种形式。中国应展现大国风范与担当,积极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尤其是曾经在中国疫情严重期间帮助过中国的国家与人民。这是展现中国态度的时刻,也是改善并塑造全新中国形象的时刻。

通过行动,中国呼吁全世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全球危机面前,没有国界、种族、肤色和口音之分,只有全人类携手才能渡过难关。中国出口或捐赠防疫物资是人道主义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并不会威胁美国或其它国家的国家安全,因而指责与诋毁毫无用处。

五、结 语

过去一般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是一件好事,因为把公共卫生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次能够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有利于集中资源解决问题。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民粹化或政治操纵下的公共卫生“安全化”问题变成了一件坏事,这是公共卫生问题与“安全化”结合的一个新现象和新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也威胁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各国不应彼此责难,而应携手共渡难关。国际社会应“安全化”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议题,以让全人类认识其危害并共同抗击疫情,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不应像美国一样,带有政治意图,恶意中伤他国。